

# 典型贫困县乡村贫困化分异机制及 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何莎莎 方斌 谢雪<sup>1</sup>

(1. 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客观分析典型贫困县乡村贫困化分异机制及脱贫稳定性, 是推进乡村振兴有效实施的应有之义。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结合村域和农户两种尺度剖析典型贫困县乡村贫困化成因, 并基于研究区自身特色探讨其脱贫稳定性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 结果表明: (1) 阜南县各乡镇贫困村核密度差异显著, 总体呈外密内疏之势, 部分区域呈核心面状式集聚分布, 按照核密度值将贫困村分为 5 个一级核心区、4 个二级核心区和 5 个三级核心区。(2) 从村域尺度分析, 残疾户占比和生病户占比等发展潜力因素, 遭灾占比、到县城和乡镇中心、主要干道的距离和村平均高程等区位条件因素是影响农村致贫的主导因素; 从农户尺度探究, 行政村属性、贫困户属性、家庭规模、残疾或疾病、劳动力占比和外出务工占比是研究区农户致贫的显著因素。(3) 综合村域层面和农户层面分析, 外出务工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以增强贫困村内生动力和贫困户生计水平, 是推动研究区脱贫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 5 大核心要义探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衔接机制, 旨在为该地区乡村振兴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 贫困村 区域贫困 贫困地理学 Logistic 回归 阜南县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227(2022)03-0711-14

贫困作为全球性的重大难题, 将其全面消除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sup>[1,2]</sup>。中国作为二元经济结构大国, 精准扶贫成为了新时期扶贫开发伟大创新, 也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sup>[3,4]</sup>。解决相对贫困将替代消除绝对贫困成为 2020 年之后中国扶贫工作的重心。确保脱贫稳定性是推进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根本, 寻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之法刻不容缓<sup>[5]</sup>。

对贫困的理解最早从经济收入角度出发, 早在 1798 年, Malthus 在《人口原理》中指出贫困是由于收入过低而不能维持生活必要需求的一种状况<sup>[6]</sup>。此后, 通过 Booth<sup>[7]</sup>、Townsend<sup>[8]</sup>和 Sen<sup>[9]</sup>等的深入研究, 逐步认识到贫困的复杂化和多元化, 绝对贫

---

**作者简介:** 何莎莎(1989~), 女,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贫困地理学. E-mail:heshasha\_gem@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29, 41671174);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164320H116)

困<sup>[10]</sup>、相对贫困<sup>[10]</sup>、多维贫困<sup>[11]</sup>等概念相继被提出。Harris<sup>[12]</sup>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指出地区经济发展迟缓与其地理区位有一定关系,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不同地区的地理特质对其空间分布差异影响较大<sup>[13]</sup>,地理环境限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致贫的至关因素<sup>[14]</sup>。从地理学视角关注区域贫困有助于揭示贫困发生机理,更好地把握贫困的多维性和区域性<sup>[15]</sup>。围绕区域性贫困问题,学界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减贫路径<sup>[17,18]</sup>、空间贫困陷阱验证<sup>[19,20]</sup>、区域贫困瞄准对象研究<sup>[21]</sup>和致贫因素识别<sup>[22,23]</sup>等方面,如李寻欢等<sup>[1]</sup>基于空间贫困理论深入探讨了中国深度贫困县的贫困格局,并对区域多维贫困的评估体系进行探究;丁建军等<sup>[14]</sup>对国内外贫困研究进展追本溯源,尝试对区域贫困的格局、形成机理和应对策略以地理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周扬等<sup>[16]</sup>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农村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多维剖析,并对脱贫后的政策重点倾斜县全面识别;刘小鹏等<sup>[11]</sup>对多维贫困的内涵和空间贫困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并以空间贫困理论为基础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测度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格局。

综上,学界已对区域贫困及其分异机制开展了有益研究,但依然存在待探索之处:(1)就研究尺度而言,近年来诸多学者开展了不同空间尺度的实证研究<sup>[24,25,26]</sup>,但多集中于宏观、中观尺度,微观尺度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结合村域和农户两种尺度分析贫困成因更能凸现实意义;(2)就研究方法而言,当前研究较少涉及对典型贫困区农户致贫因素的定量探讨,且大多基于传统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农户视角的调研实证研究更是缺乏,本研究通过对阜南县实地走访调研,立足于人本主义,结合社会个体对所处环境的认知,从村域和农户的综合视角分析了贫困地区的致贫因素,对贫困村精准施策及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指导意义。(3)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虽然学界对二者的紧密关联已达成共识,但对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机制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本研究尝试厘清两大阶段的有效衔接路径,不仅能丰富乡村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框架与理论体系,亦可为该地区提升乡村振兴的施策成效提供依据。

阜南县“三区合一”,不仅位于皖北贫困区,又是沿淮行蓄洪区,还隶属于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典型的脱贫攻坚主战场。鉴于此,本文以阜南县为区域研究单元,基于安徽省贫困县评估调研数据,兼顾宏观与微观结合,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与 GIS,挖掘贫困村的致贫因素及空间分布特征,并对脱贫稳定性及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进行探讨,以期为解决相对贫困和乡村振兴衔接提供理论借鉴。

## 1 理论基础

### 1.1 乡村贫困的源起及发展历程

中国对贫困问题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城乡差距问题蔓延和地理资本差异凸显,以经济学与社会学为主的贫困问题研究在中国逐步扩展。21 世纪以来,多维贫困、空间贫困等概念被逐步引入,贫困问题开始逐渐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热点和前沿。乡村贫困问题源于学者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研究,而政府作为解决乡村贫困问题的执行者,界定乡村贫困标准并制定相关政策,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与支撑。回溯中国乡村扶贫发展历程(图 1):小规模救济式扶贫(1949~1978),该阶段以政府为核心抓手,国家拨款为依靠,无偿救济为主要手段,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整体上处于绝对贫困状况;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该阶段改革成效显著,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以无偿救济为主的扶贫方式转型为助力为主、救济为辅,增加就业、以工代赈、提供信贷等是当时主流扶贫方式;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2000),该阶段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并将县确定为瞄准对象。国家级贫困县从 1986 年至 1994 年由 331 个调整为 592 个<sup>[11]</sup>。整村推进式扶贫(2001~2013),该阶段贫困村被列为重点瞄准对象,确定贫困村 14.8 万个;精准扶贫(2013~2020),该阶段贯彻实施“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扶贫成效显著。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乡村贫困、贫困测度及类型划分等问题迅速成为学科关注焦点,地理学相关学者借助 GIS 与 RS 等空间分析技术的学科优势,探讨了乡村贫困的空间格局与地域分异,为制定较针对性的减贫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 1.2 空间贫困理论

地理要素对贫困的影响作用及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贫困地理学研究的核心<sup>[14]</sup>。早期空间经济学提出经济欠发达区的地理

区位对经济发展制约显著<sup>[27]</sup>,可被追溯为空间贫困理论的源头。Jallan 等学者提出了地理资本的重要概念,并指出地理资本是提高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显著因素<sup>[1]</sup>,是研究“空间贫困陷阱”的先行者。地理要素禀赋短缺会造成农户生计资本匮乏,降低个体自身生产力,导致其陷入长期贫困。Bird<sup>[20]</sup>和 Daimon<sup>[28]</sup>也认为空间贫困陷阱常出现在因区位偏远、地理资本低而处于长期贫困状态的地区。随着学者对空间贫困体系的深入研究,概括了衡量空间贫困的四大脆弱因素:地理区位偏远、生态环境较差、经济系统脆弱和社会福利缺失<sup>[29,30,31]</sup>。近年来,中国地理学贫困研究发展迅速,刘彦随等<sup>[32]</sup>学者在“空间贫困陷阱”的基础上提出了“孤岛效应”,该理论是根据农村贫困演化格局总结的一种在空间上孤立存在的地域性贫困现象,该空间长期信息比较封闭,与外界交流不易<sup>[2]</sup>。该理论揭示了贫困集聚的根源,是解决区域性贫困的重要理论依据。

### 1.3 区域贫困与个体贫困

区域贫困与个体贫困是精准扶贫基于不同视角审视贫困问题的两个重要部分,二者均具有多维属性。个体贫困是将贫困人口作为瞄准对象,主要包括特殊困难群体、个人或家庭,而区域贫困指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范围,包括贫困村、贫困县、贫困地区等。虽二者瞄准对象有所差异,但应协同推进。个体贫困指由于个人因素导致生计资本匮乏的现象,主要聚焦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两大维度<sup>[33]</sup>。区域贫困是地理资本缺乏带来地理区位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福利供给不足等因素的综合表现,其重点关注贫困与外界环境的关系<sup>[34,35]</sup>。区域贫困可视作个体贫困在空间上发展的演化载体,个体贫困是区域贫困在社会生活中的表征对象,当个体贫困累积放大到一定程度即会形成区域贫困,而由于地理资本劣势因素导致的区域贫困又会反作用贫困人口的生计能力,迫使贫困群体生计资本缺失。个体贫困与区域贫困二者即相互促进,又辩证统一<sup>[36,37]</sup>。

区域贫困是“人”“地”“业”三要素耦合失调的复杂动态系统<sup>[1]</sup>(图1)。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子系统是贫困与社会福利的关系表征,社会制度与公共福利缺失导致个人或群体在医疗保障、教育水平、就业机会和社会政策等方面不足;以“地”为核心的环境子系统是贫困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表征,贫困地域在区位条件、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严重劣势;以“业”为核心的经济子系统是贫困与区域发展水平的关系表征,贫困地域在产业发展和市场流通等方面动力不足;各子系统之间随着外部环境和内生动力系统的调控,“人业地”耦合过程中的信息流、能量流和物质流不断演化,任一要素分配失调都可使耦合发生“逆向循环”,跌入“贫困陷阱”。区域贫困主要是通过改变区域环境促进贫困人口增收,而个体贫困更侧重于提高个体的脱贫内生动力,二者同等重要需系统关注<sup>[1,3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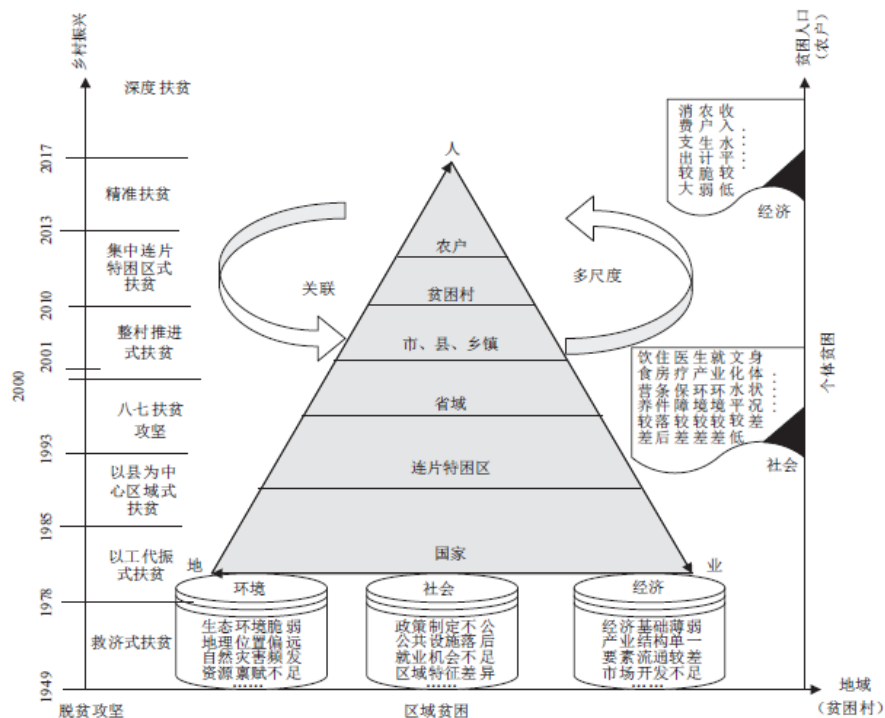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贫困发展历程与理论框架

## 2 数据与方法

### 2.1 研究区概况

阜南县区位独特,地处安徽西北,位于豫皖交界处。区域总面积为 1801km<sup>2</sup>,包括 28 个乡镇和 1 个经济开发区,下辖 328 个行政村(社区),2019 年末总人口约 173 万人,乡村人口高达 152 万,属劳务输出大县。2019 年末地区生产总值约 278 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约 57 亿元,年粮食播种面积高达 1622km<sup>2</sup>,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研究区属于典型的“三区合一”,不仅位于皖北贫困地区,又是沿淮行蓄洪区,还隶属于大别山连片特困区,又地处淮河中上游结合部,自然灾害频繁,是淮河防汛重点区域,另有部分群众居住在湖心庄台、堤顶庄台等行陡坡大处,易摔伤致残,因病致贫占比 54.94%,因残致贫占比 20.79%。综上,阜南县不仅有蓄洪区较为脆弱的自然环境,而且作为对“打工经济”高度依赖的劳务输出大县,因病因残致贫占比较大,加之地区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致使其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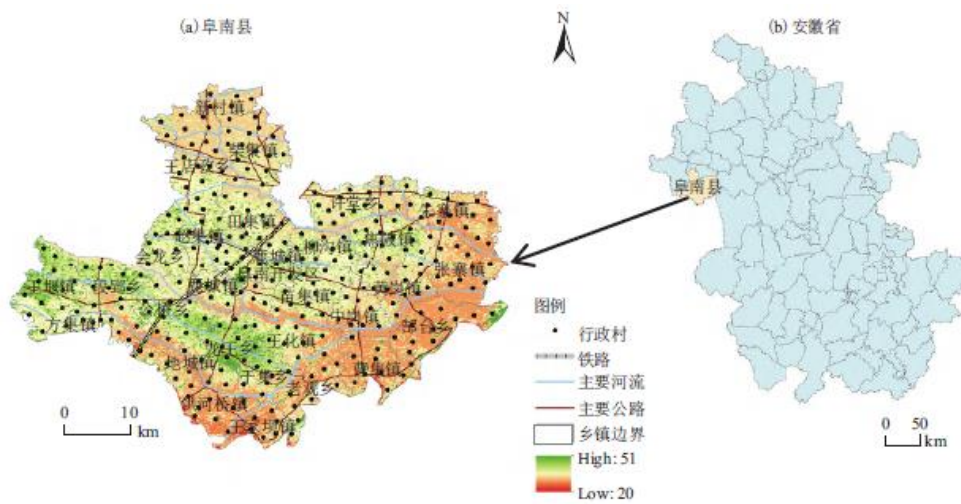


图 2 阜南县区位图和行政区范围

###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包含村级层面和农户层面 2 类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省精准扶贫评估调查的贫困户问卷和村干部问卷。根据阜南县扶贫办提供的数据库,对于样本的选择,(1)就抽样村域层面,按照“统分结合,因地制宜”、“聚焦短板,分层抽样”、“点面兼顾,关注死角”等原则,共抽查 28 个乡镇的 28 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 18 个,非贫困村 10 个,行政村的抽样基本实现阜南县乡镇全覆盖。18 个贫困村中,偏远、边角贫困村 9 个,县内随机抽查贫困村 9 个,普查村民小组 30 个。(2)就抽样农户层面,随机抽取被抽样行政村的脱贫户,普查规模较小抽样行政村的建档立卡户,共获取贫困农户有效样本数据 849 户份。参考相关文献<sup>[45,46]</sup>,农户尺度主要选取的指标包括行政村属性、户主情况、家庭成员、收入和支出等;(3)村域尺度主要选取的指标能够代表村的地理区位、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等。

### 2.3 研究方法

#### 2.3.1 二元 Logistic 回归

多变量回归是利用可能对贫困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和结构关系模型对农户贫困的相关性进行识别<sup>[38]</sup>。本研究结合 OddsRatio 值和估计系数分析农户层面的致贫成因。模型如下：

$$Y_i = \alph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beta_4 X_4 + \beta_5 X_5 + \beta_6 X_6 + \beta_7 X_7 + \beta_8 X_8 + \beta_9 X_9 + \beta_{10} X_{10} + \beta_{11} X_{11} + \beta_{12} X_{12} + \beta_{13} X_{13} + \varepsilon \quad (1)$$

式中： $Y_i$  为虚拟变量，表示人均年收入 ( $i=1\cdots n$ )； $\alpha_0$  表示常数项； $\beta$  表示回归系数。 $X_1$  为行政村属性； $X_2$  为户主性别； $X_3$  为户主教育水平； $X_4$  为户主年龄； $X_5$  表示贫困户属性； $X_6$  表示建档立卡人口数； $X_7$  表示抚养比； $X_8$  表示劳动力比重； $X_9$  表示外出打工比重； $X_{10}$  表示务农比重； $X_{11}$  表示义务教育比重； $X_{12}$  表示拥有残疾或疾病人数占比； $X_{13}$  表示看病花销占比； $\var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 $X_1 \sim X_{13}$  变量的基本特征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及计算方法

变量	变量基本统计特征	预设属性
行政村属性 $X_1$	虚拟变量，贫困村=1，样本数 565，占比 66.55%；非贫困村=0，样本数 284，占比 33.45%	正向
户主性别 $X_2$	虚拟变量，女性=1，样本数 176，占比 20.73%；男性=0，样本数 673，占比 79.27%	正向
户主教育水平 $X_3$	虚拟变量，文盲和小学=1，样本数 624，占比 73.50%；初中及以上=0，样本数 225，占比 26.50%	正向
户主年龄 $X_4$	虚拟变量，60 岁以上=1，样本数 570，占比 67.14%；60 岁以下=0，样本数 279，占比 32.86%	正向
贫困户属性 $X_5$	虚拟变量，一般户=1，样本数 412，占比 48.53%；低保户五保户=0，样本数 437，占比 51.47%	负向
建档立卡人口数 $X_6$	虚拟变量，人口数大于 4=1，样本数 339，占比 39.93%；人口数小于 4=0，样本数 510，占比 60.07%。	正向
抚养比 $X_7$	16 岁(含)以下与 60 岁(含)以上人口与 17~59 岁人口之比(%)	正向
劳动力比重 $X_8$	家庭中 17~59 岁有劳动能力的人数(学生除外)占比(%)	负向
外出打工比重 $X_9$	家庭中累计半年以上外出务工人员占比(%)	负向
务农比重 $X_{10}$	家庭中半年以上在家务农人口占比(%)	正向
义务教育比重 $X_{11}$	家庭中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数占比(%)	正向
拥有残疾或疾病人数占比 $X_{12}$	家庭中残疾(含精神病)和患慢性病、大病人占比(%)	正向
看病花销占比 $X_{13}$	看病花销占家庭纯收入比值(%)	正向

### 2.3.2 核密度分析

本研究通过全县贫困村密度的空间格局来探讨贫困村的分布差异，对贫困村的质心点进行密度估计，核密度结果可用来表征识别研究区内的贫困村集聚特征<sup>[39]</sup>。密度估计模型为：

$$f(x, y) = \frac{1}{np^2} \sum_{i=1}^n K\left(\frac{D_i}{p}\right) \quad (2)$$

式中： $f(x, y)$ 为位于 $(x, y)$ 贫困村质心的密度估计，值越大，表明贫困村分布越密集； $n$ 为观测数值，即带宽范围内的贫困村数量； $p$ 为规则区域带宽， $p$ 值对核密度结果影响较大，由于村级贫困影响范围较小，本研究依次以1、2、3、4、5km等调试，最终选取3km估计； $K$ 为核函数； $D_i$ 为位于 $(x, y)$ 贫困村距第 $i$ 个观测位置之间的距离。

### 2.3.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对地理事物空间异质性较为敏感<sup>[40]</sup>，目前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到各个方面<sup>[41, 42, 43]</sup>，本研究应用该方法探测村域贫困化空间分异机理，公式为：

$$PD = 1 - \frac{1}{N\delta^2} \sum_{i=1}^L N_i \delta_i^2 \quad (3)$$

式中： $PD$ 为乡村贫困影响因素解释力指标； $N$ 和 $\delta^2$ 分别为整个样本数和方差； $N_i$ 和 $\delta_i^2$ 为 $i$ 层样本量和方差；假设 $\delta_i \neq 0$ ，模型成立， $PD$ 的取值范围是 $[0, 1]$ ， $PD=0$ 时，代表各因素对乡村贫困空间分异特征没有影响力， $PD=1$ 时，表明各因素完全影响乡村贫困的空间分布。 $PD$ 值越大，表明影响因素对乡村贫困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影响越大，反之越弱。

## 3 结果分析

### 3.1 乡村贫困化空间格局及其成因

#### 3.1.1 农村贫困化空间格局

贫困村密度是农村贫困化的重要表现，分析其空间格局及成因，可深入诊断农村贫困分异机制。如图3a所示：阜南县共识别出贫困村90个，分布于28个乡镇和1个开发区。从数量看，各乡镇贫困村的平均值约3个，王堰镇、段郢乡、洪河桥镇、公桥乡、许堂乡、郜台乡、黄冈镇、朱寨镇、焦陂镇和张寨镇等10个乡镇高于全县平均值，其中洪河桥镇最多(6个)，会龙镇、阜南开发区、赵集镇、田集镇、新村镇、柳沟镇、王店孜乡和柴集镇等8个乡镇低于全县平均值。公桥乡贫困村占行政村比例最高(50%)，经开区贫困村占行政村比例最低(0)。阜南县贫困村总面积为541.67km<sup>2</sup>，平均面积为18.68km<sup>2</sup>。各乡镇中，除经开区无贫困村外，洪河桥镇面积最大(38.26km<sup>2</sup>)，公桥乡次之(32.81km<sup>2</sup>)，柳沟镇最小(4.16km<sup>2</sup>)。此外，王化镇贫困村面积比例最高(52.63%)，公桥乡次之(48.92%)；王店孜乡贫困村面积比例最低(7.13%)。总体上看，贫困村数量和面积在各个乡镇间均差异显著。

为进一步明晰贫困村分布格局，基于Kernel空间分析对贫困村密度进行可视化，并结合趋势分析，识别出贫困村在空间上分布集中且贫困程度较高的核心地区。由图可知：阜南县贫困村总体呈外密内疏之势，部分区域呈核心面状式集聚分布，东西部高值区集聚明显，中北部较低，且由中心城区向东南西三个外围方向逐渐升高，地域差异比较明显。趋势分析进一步验证其空间

分布规律：东西呈两边高中间低的“U”型，由南向北下降态势较为显著，南北差异较大，从区域中心向西南边界逐增，最大值在边界附近，区域中北部低值集聚。这可能由于建成区地处中部偏北，该地生活水平较高，在一定空间区域内贫困化受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影响，且一个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对周边相邻村庄有“邻近效应”，故而相邻村庄贫困级别趋于相似。按照核密度值将贫困村分布的核心地区分为3级，即5个一级核心区、4个二级核心区和5个三级核心区(图3)。一级核心区主要位于公桥乡、地城镇西北部、龙王乡、朱寨镇和于集老观王化三乡镇接壤处，区内贫困村的核密度值大于0.1个/km<sup>2</sup>；二级核心区包括王堰镇、苗集镇南部、黄冈镇和中岗镇相邻地、焦陂镇东部；三级核心区主要包括洪河桥镇、王家坝镇、曹集镇、柳沟镇西北部和柴集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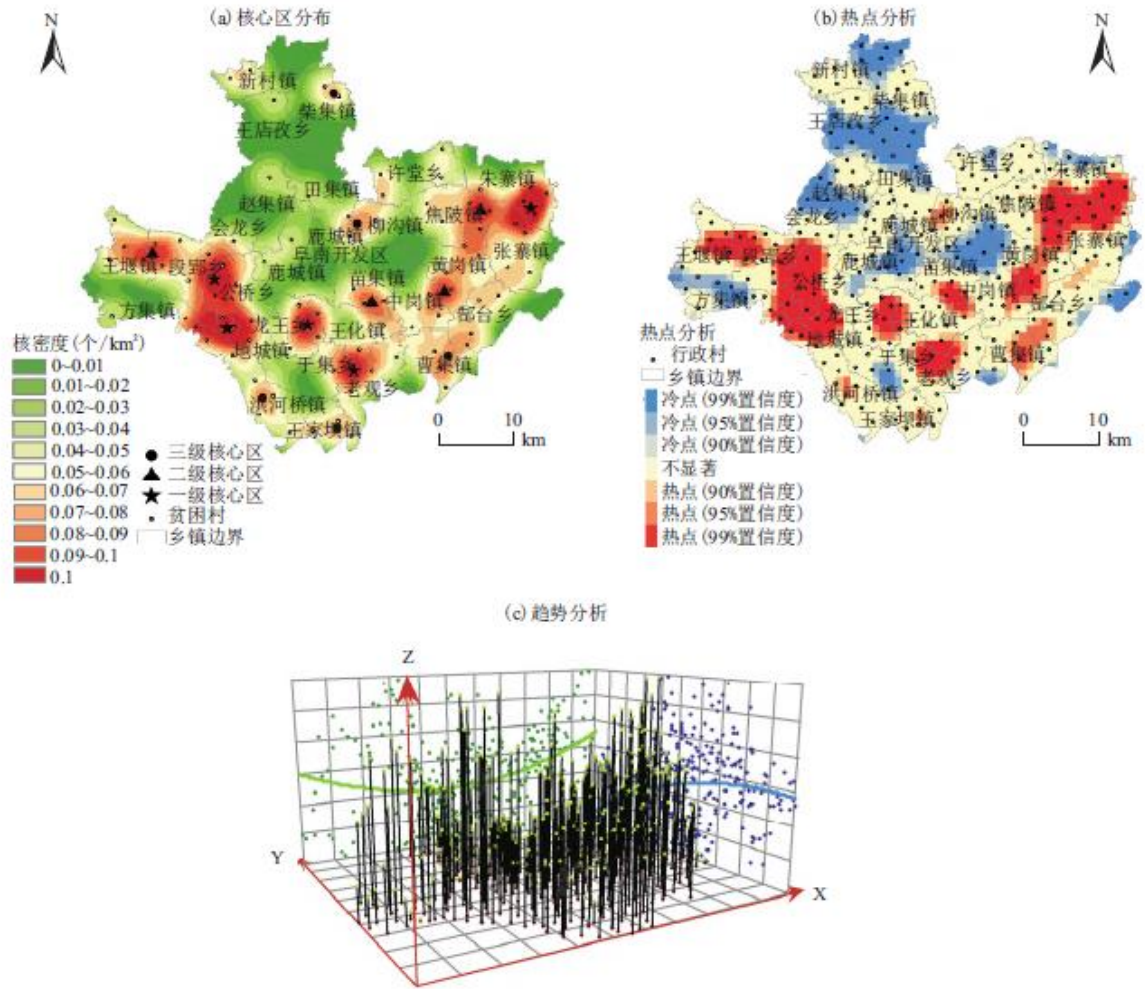


图3 阜南县贫困村核密度分布图

### 3.1.2 贫困村致贫成因分析

因子探测可定量明确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因子驱动力，通过比较其大小可识别影响阜南县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的因子贡献率。结合阜南县实际，主要遴选了发展基础(村总人口数 X1、村人均耕地面积 X2、村人口密度 X3、村耕地规模 X4)、发展潜力(村生病人户占比 X5 和村残疾户比例 X7)和区位优势(村遭灾占比 X6、村平均高程 X8、起伏度 X9、坡度 X10、各村到县城中心的距离 X11、各村到乡镇中心的距离 X12、各村到主要干道距离 X13、各村到主要河流距离 X14)等三大因素的 14 个指标作为自变量来解释阜南县农村贫困化的空间分异特征。

由图表可知：各指标与农村贫困化的关联性差异显著，X5和X7等发展潜力因素，X6、X8、X11、X12和X13等区位条件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是影响农村致贫的主导因素。就村生病户占比来看，q值较大的是王店孜乡和中岗镇，说明生病户占比对该地区贫困地域分异的解释力最强。就村残疾户比例来看，q值较大的是王化镇，残疾户比例的驱动力对该地区贫困地域分异的影响最大。阜南县是皖北的劳务输出大县，“务工+务农”兼顾是该地区有效的家庭增收途径，“打工经济”是脱贫户的主要经济模式，而高度依赖“打工经济”对生病户和残疾户经济增收有较大障碍，以上地区应注意对生病户和残疾户的重点关注。就遭灾占比来看，王家坝镇的q值最大，阜南县地处淮河中上游分界处，王家坝是淮河流域防汛的重点区域，遭灾占比对该地区贫困地域分异的解释力最强。就各村到县城中心的距离来看，曹集镇q值较大，说明到县城中心距离的驱动力对该地区贫困地域分异的影响最大；就各村到乡镇中心的距离来看，地城镇的q值较大。主要由于X11和X12反映的是村庄受行政中心的经济带动程度和公共政策福利辐射的难易状况。距离越近，越易享受到医疗、教育和社会政策福利等服务，受行政中心的经济带动程度越容易。此外，距行政中心较远的村以发展传统农业为主，种植业结构性改革实施难度较大，而距行政中心较近的村以发展商品性农业为主，故而收益更大。就各村到主要干道距离来看，地城镇和公桥乡的q值较大，到主要干道距离是该村交通区位的重要表征，客观反映了该地区村庄与外界交流的便捷度，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阜阳县四条省道和两条高速公路交汇穿境，是各村与外界的重要纽带，距主干道越近越不易发生贫困，地城镇和公桥乡应注意改善交通条件，防止“孤岛效应”。海拔高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但阜南县地形差异较小，所以村平均高程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对阜南县贫困地域分异的解释力并不强。

### 3.2 微观尺度的致贫成因及机理探析

不同空间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互馈和嵌套作用，微观的人口贫困通常受制于中、宏观尺度的经济状况，农户作为最小的扶贫瞄准单位，更易受地理环境影响<sup>[47]</sup>。本研究基于849户农户数据分析，阜南县20.73%的贫困家庭户主为女性，户主平均年龄为65.39岁，老龄化程度严重。大多数户主的受教育水平较低，26.39%的人具有中学教育水平，仅有0.10%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此外，贫困家庭中有义务教育的比重占28.30%，有60岁以上老人的贫困户家庭占比高达71.2%，有16岁以下成员的贫困户家庭占比高达33.7%，39.90%的贫困家庭没有劳动力。贫困家庭的非农工作人员较少，仅有34.59%的贫困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拥有残疾或疾病成员的贫困家庭占比高达91.41%，看病花销较大。依据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进行统计，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农户的致贫成因。因变量为农户人均年收入，低于扶贫标准线赋值为1，反之为0。采用公式(1)识别农户致贫的主导因素，回归结果见表3。

表2 阜南县贫困村地域分异因子探测结果

因子指标	q 统计量	P 值	因子指标	q 统计量	P 值
总人口数 X1	0.024	0.474	村平均高程 X8	0.079	0.006
人均耕地面积 X2	0.031	0.973	村平均起伏度 X9	0.125	0.297
人口密度 X3	0.064	0.452	村平均坡度 X10	0.116	0.429
耕地规模 X4	0.034	0.804	到县城中心的距离 X11	0.090	0.000
生病户占比 X5	0.473	0.000	到乡镇中心的距离 X12	0.129	0.002
遭灾占比 X6	0.187	0.001	到主要干道距离 X13	0.177	0.048
残疾户比例 X7	0.118	0.008	到主要河流距离 X14	0.054	0.5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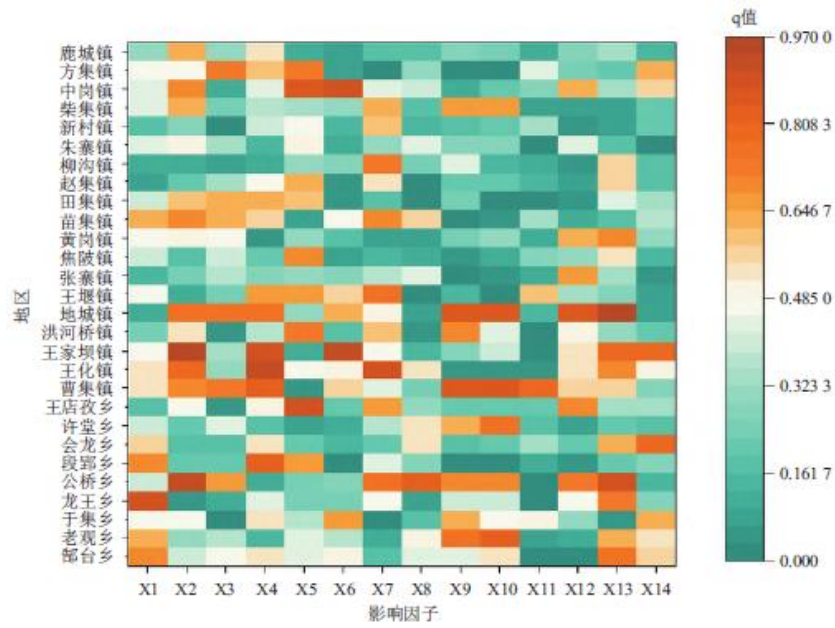


图 4 阜南县镇域贫困村地域分异因子探测结果

表 3 农户贫困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SE 统计量	Sig.	OddsRatio
行政村属性	0.503**	0.217	0.021	1.654
户主性别	-0.118	0.274	0.667	0.889
户主教育水平	-0.342	0.253	0.177	0.711
户主年龄	-0.573	0.361	0.113	0.564
贫困户属性	-0.420**	0.210	0.045	0.657
建档立卡人口数	1.146***	0.378	0.002	3.145
抚养比	-0.143	0.172	0.406	0.867
劳动力比重	-2.437***	0.867	0.005	0.187
外出打工比重	-5.647***	1.208	0.000	1.004
务农比重	-0.486	0.914	0.595	0.615
义务教育比重	-0.023	0.898	0.980	0.977
拥有残疾或疾病人数占比	0.607**	0.283	0.032	1.834
看病花销占比	0.177	0.277	0.522	1.194

常量	-0.156	0.532	0.770	0.856
-2Loglikelihood	629.383			
Model chi-square	491.497		0.000	
准确度百分比	84.70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			0.573	

注：\*\*\*, \*\*分别表示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表明，阜南县农户贫困影响显著的变量有行政村属性、贫困户属性、家庭规模、残疾或疾病、劳动力占比和外出务工占比。行政村属性在 5%的水平上显著，其估计系数(0.503)表明贫困村的家庭比非贫困村的家庭致贫风险大 1.654 倍，这可能是和行政村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有较大关系，其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影响较大，说明农户致贫的成因不仅要考虑贫困家庭自身特征，同时其所处环境特征也不可忽视；贫困户属性在 5%的水平上显著，其估计系数(-0.420)表明一般户家庭比低保户和五保户家庭致贫风险小 0.657 倍，这主要是由于低保户和五保户的收入结构主要来源于社会救助；家庭规模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其估计系数(1.146)表明规模较小的家庭比规模大的家庭致贫风险大 3.145 倍，这主要是由于规模较大的家庭会拥有较多的劳动力，除了工资性收入之外，身体素质较高的 60 岁以上老人也可务农或从事政府公益岗为家庭增收；劳动力比重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其估计系数(-2.437)表明劳动力比重较大的家庭比劳动力比重较小的家庭致贫风险小 0.187 倍，劳动力越多收入就越大，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就越强；外出打工比重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其估计系数(-5.647)表明外出务工比重较大的家庭比外出务工比重较小的家庭致贫风险小 1.004 倍，这主要是由于外出务工可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工作时长半年以上可以给家庭带来稳定经济来源，进而增加家庭脱贫可能性；拥有残疾或疾病人数占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其估计系数(0.607)表明拥有残疾或疾病人数占比较大的家庭比拥有残疾或疾病人数占比较小的家庭致贫风险大 1.834 倍，主要由于拥有残疾或疾病的家庭整体上劳动能力偏弱，不仅大大降低了家庭的劳动力参与率，其经济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和种养殖收入占比较大，而且从看病花销占比可以看出，其医疗费用对致贫也有一定影响，虽然医疗保障大幅度提高了报销比例，看病花销占比在整体上影响并不显著，但针对拥有残疾或疾病农户的家庭面临的贫困风险仍不可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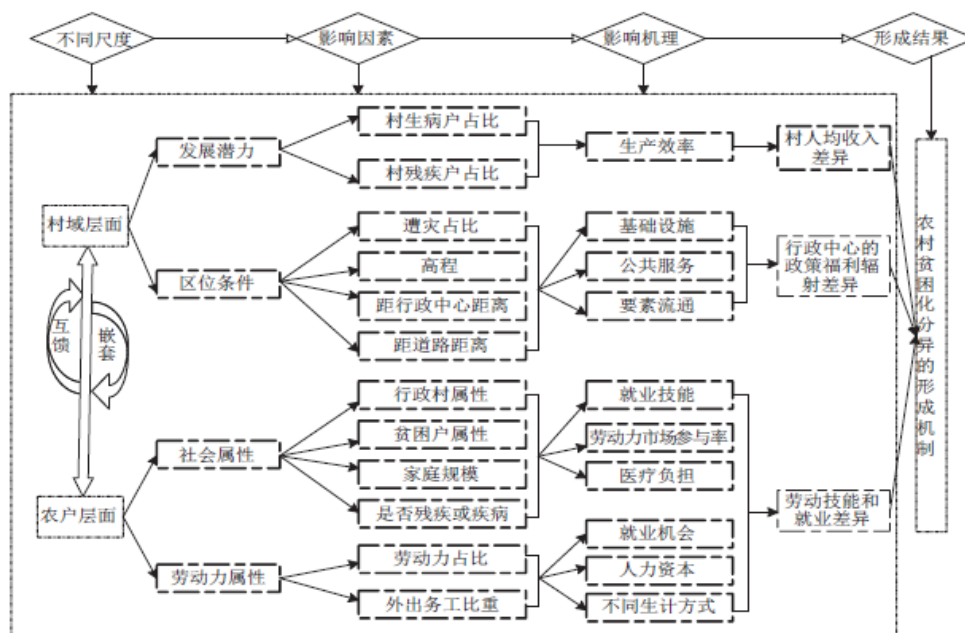


图 5 阜南县不同层面乡村贫困化致贫因素及机理

### 3.3 脱贫稳定性及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

阜南县减贫与发展实践不仅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还通过助推乡村人地业等要素的协调流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根基。结合阜南县村域尺度和农户尺度的致贫因素，探讨其脱贫稳定性：(1)就村域层面分析，研究区致贫是由残疾户占比和生病户占比等发展潜力因素，遭灾占比、到县城和乡镇中心、主要干道的距离和村平均高程等区位条件因素及生产生活方式等人文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区位条件较差或者发展潜力较弱的村域，距离行政中心较远会阻碍村庄“务工+务农”增收模式的有效实施、残疾或疾病比例较高的村庄，其较重的医疗负担和较弱的内生动力都会制约贫困村的脱贫稳定性。(2)就农户层面分析，农户尺度的致贫因素是该地区贫困的主要“贡献者”，外出务工比重和拥有残疾或疾病人数占比影响较为显著，“打工经济”是脱贫户的主要经济模式，而对“打工经济”的高度依赖会对生病户和残疾户有较大障碍，转移性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结构，脱贫内生动力严重不足且家庭医疗开销较大，建议因人因户施策，重点关注此类脱贫户的脱贫稳定性。综合村域和农户两大层面分析，外出务工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以增强贫困村内生动力和贫困户生计水平，是促进稳定脱贫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乡村振兴是乡村稳定脱贫到致富奔小康的有效支撑，通过五位一体全面激活乡村造血能力，是精准扶贫的政策延续和战略深化。由阜南县乡村致贫因素探讨可明显得知，依赖“打工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和农户生计水平较低是阜南县实现脱贫稳定性向乡村振兴过渡的最大障碍。阜南县农村减贫因地制宜、统筹施策调控区域资源配置，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一体化发展，为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奠定坚实基础。为巩固脱贫成效，落实乡村振兴的有效实施，本文分别从乡村振兴的 5 大核心要义探讨其与精准扶贫的衔接机制(图 6)：(1)在产业方面，作为地区发展的驱动力和核心枢纽，阜南县立足于自身要素资源禀赋，通过“水患变水利”调整发展方式，着力发展水生蔬菜，利用濠洪洼分洪道积极发展耐水林和湿地林等，大力扶持水禽养殖项目。利用自身禀赋优化产业结构，虽助推了乡村产业发展，但仍有部分产业缺乏市场风险抵抗力。作为农业大县，为促进乡村振兴有效实施，首先建议阜南县做大特色产业，依托当地特色农产品例如水生蔬菜和中药材苗木等建设产业集群，全力培育村级特色产业项目，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管理一体化；然后推进产业融合，以优势传统农产品为核心，依托区域优势，积极发展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推动产业链延伸，构建一二三产上下游融合发展新格局，以提升乡村产业振兴水平。(2)在人才方面，阜南县实现人回乡、厂回迁、情回归的“三回”目标，通过招商引资和“凤还巢”方式，因地制宜建设扶贫车间，达到了企业发展和贫困人口增收的双赢局面。为进一步强化阜南县乡村振兴的实施，首先建议加强和健全“内培外引”的人才激励机制，以优质环境吸引返乡人才，然后搭建创业基地培育留乡人才，并且组织汇聚乡贤和企业家积极投身家乡建设，以提升乡村人才振兴水平。(3)在文化方面，阜南县通过开展好人及道德模范评选、文明创建和系列文化活动“组合拳”，优化乡风民风。为加强阜南县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文化衔接，建议植根于当地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利用乡村文化遗产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利用文化产业助推乡村发展，以促进乡风文明和文化繁荣。(4)在生态方面，阜南县处淮河中上游结合部，自然灾害频发，生态比较脆弱，也是制约发展的第二大障碍。生态环境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依托和基础支撑，在提升人居环境方面，长效机制还不健全，为提升阜南县乡村振兴的生态宜居水平，首先建议结合异地搬迁、危房改造和土地整治等工程常态化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消除农村“脏乱差”现象，提升乡村三生空间的环境水平。其次是强化美丽乡村建设，一体化推进农村“三大革命”，打造农民品质生活，统筹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系统，持续增强改善力度。(5)在组织方面，阜南县结对帮扶、责任到人，成立“千人专班”走访排查，帮助乡村摸清问题、拿出措施、补齐短板。同时开展示范村调研，帮助镇村精准精细查找问题和不足，全力夯实脱贫攻坚基层基础。为提升阜南县乡村振兴的组织治理水平，建议借鉴脱贫经验，引进事业单位和优秀乡贤等社会团体组建相关职能部门，成立乡村振兴小组，统筹参与乡村振兴的有效实施和成效监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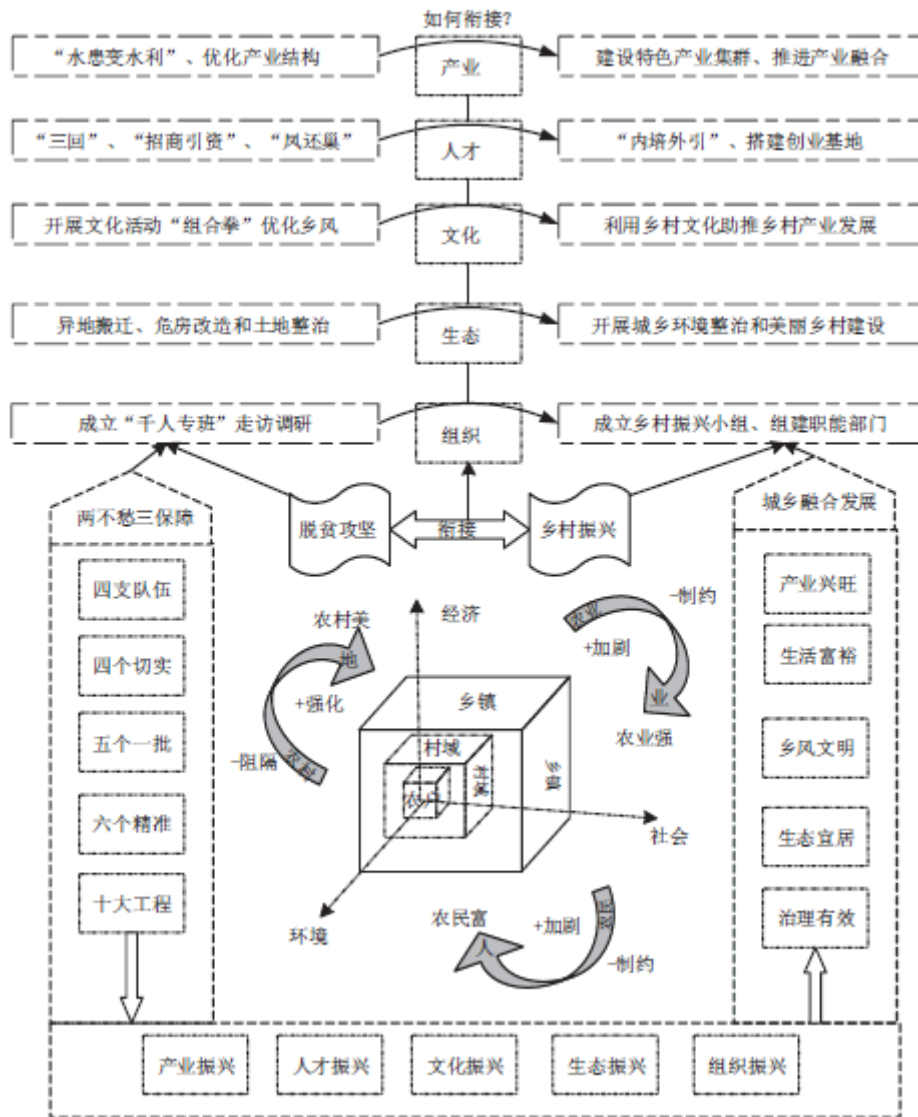


图6 阜南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逻辑框架

## 4 结论与讨论

### 4.1 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客观分析了典型贫困县乡村贫困化分异机制及脱贫稳定性，结合村域和农户两种尺度剖析典型贫困县乡村贫困化成因，并基于研究区自身特色探讨其脱贫稳定性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可为促进贫困地区转型发展，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阜南县各乡镇贫困村核密度差异显著，总体呈外密内疏之势，部分区域呈核心面状式集聚分布，按照核密度值将贫困村分为3级，即5个一级核心区、4个二级核心区和5个三级核心区。一级核心区位于公桥乡、地城镇西北部、龙王乡、朱寨镇和于集老观王化三乡镇接壤处；二级核心区包括王堰镇、苗集镇南部、黄冈镇和中岗镇相邻地、焦陂镇东部。三级核心区包括洪河桥镇、王家坝镇、曹集镇、柳沟镇西北部和柴集镇局部。

(2)从村域尺度分析,残疾户占比和生病户占比等发展潜力因素, 遭灾占比、到县城和乡镇中心、主要干道的距离和村平均高程等区位条件因素是影响农村致贫的主导因素;从农户尺度探究,行政村属性、贫困户属性、家庭规模、残疾或疾病、劳动力占比和外务工占比是研究区农户致贫的显著因素, 摆脱“打工经济”、增强农户生计是阜南县实现脱贫稳定性向乡村振兴过渡的有效途径。

(3)综合村域层面和农户层面分析,外出务工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以增强贫困村内生动力和贫困户生计水平,是推动研究区脱贫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5大核心要义探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衔接机制,旨在为该地区乡村振兴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 4.2 讨论

贫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表现形式,贫困地域系统是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的复杂系统,贫困村密度作为贫困化的重要表征,对深入剖析贫困和地理环境之间的联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就数据和结果来看:本文虽对阜南县农村贫困化分异格局和致贫成因进行了探测,但结果显示,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地理要素对贫困化分异的解释力并不强,这可能是由于阜南县地处平原地区,地理要素对其作用较小,后续还须结合当地社会文化和福利政策等因素深入分析;由于贫困的多维属性,减贫工程系统而复杂,而本研究的贫困指标仅选取了人均年收入,说服力有待提高,未来面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提升农户生活质量为宗旨,应着重以多维视角探讨区域贫困分异规律。(2)就研究区发展环境来看:首先,在安徽省大环境发展背景下,其发展政策是东向发展,且集全省之力着重发展省会及周边区域<sup>[44]</sup>,所以安徽北部的整体发展大环境不容乐观;其次,在阜南县小环境发展背景下,阜南县是淮河防汛的重点区域,遭灾频率较高,而且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农户内生动力有所欠缺,后续应全方位控制因病因学因老造成的返贫风险,切实提升农户生活质量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确保脱贫可持续性。(3)本文针对阜南县村域和农户2个层面分析其脱贫稳定性,并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5大核心要义探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衔接机制,但仅对二者的衔接逻辑进行了阐述,缺乏衔接成效的定量评价,后续应强化二者的实证分析,构建指标体系对两大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提高研究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1]李寻欢,周扬,陈玉福.区域多维贫困测量的理论与方法[J].地理学报,2020,75(4):753-768.

[2]LIU Y S,LIU J L,ZHOU Y.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7,52:66-75.

[3]文琦,郑殿元,施琳娜.1949-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主题演化过程与研究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9,38(9):1272-1281.

[4]谭雪兰,蒋凌霄,王振凯,等.地理学视角下的中国乡村贫困——源起、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6):913-923.

[5]郭远智,周扬,刘彦随.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J].地理研究,2019,38(12):2819-2832.

[6]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7]BOOTH C.The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of London [M].London,UK:Williams & Northgate,1889.

[8]TOWNSEND P.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M].Berkeley,US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 
- [9]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M].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0] 鲜祖德, 王萍萍, 吴伟.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J]. 统计研究, 2016, 33(9): 3-12.
- [11] 刘小鹏, 苏胜亮, 王亚娟, 等.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村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研究[J]. 地理科学, 2014, 34(4): 447-453.
- [12] HARRIS C D. 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production[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es*, 1954, 44(8): 35-48.
- [13] KURTZ T. Scale frames and counter-scale frames: Constructing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J]. *Political Geography*, 1969, 22(3): 887-916.
- [14] 丁建军, 冷志明. 区域贫困的地理学分析[J]. 地理学报, 2018, 73(2): 232-247.
- [15] 周扬, 郭远智, 刘彦随. 中国县域贫困综合测度及2020年后减贫瞄准[J]. 地理学报, 2018, 73(8): 1478-1493.
- [16] ZHOU Y, GUO Y Z, LIU Y S, et 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and policy innovation: Some practi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China [J]. *Land Use Policy*, 2018, 74: 53-65.
- [17] ZHOU Y, GUO Y Z, LIU Y S. Land consolidation boos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 [J]. *Land Use Policy*, 2019, 82: 339-348.
- [18] KANBUR R, VENABLES A J. Spatial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5, 5(1): 1-2.
- [19] BIRD K, SHEPHERD A. Livelihoods and chronic poverty in Semiarid Zimbabwe [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3): 591-610.
- [20] PARK A F, WANG S, WU G, et al. 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6(1): 123-153.
- [21] 罗耀文, 任周鹏, 葛咏, 等. 基于 PCA-GWR 方法的村级贫困时空格局及致贫因素分析 [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20, 22(2): 231-245.
- [22] 程名望, 李礼连, 张家平.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2): 1-10.
- [23] 刘小鹏, 李永红, 王亚娟, 等. 县域空间贫困的地理识别研究——以宁夏泾源县为例 [J]. 地理学报, 2017, 72(3): 545-557.
- [24] 梁晨霞, 王艳慧, 徐海涛, 等. 贫困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9, 38(6): 1389-1402.
- [25] 陈焯烽, 王艳慧, 赵文吉, 等. 中国贫困村致贫因素分析及贫困类型划分 [J]. 地理学报, 2017, 72(10): 1827-1844.

- 
- [26] HARRIS C D. 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production[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es*, 1954 (44):35-48.
- [27] DAIMON T.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welfare and poverty: Lessons from a regional targeting programme in Indonesia[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01, 15(4):345-367.
- [28]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Chronic poverty report 2004-05. Manchester: CPRC,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04.
- [29] 刘倩, 陈佳, 吴孔森, 等. 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分析——以商洛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996-1012.
- [30] 罗庆, 李小建. 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进展[J]. *经济地理*, 2014, 34(6):1-8.
- [31] 刘彦随, 周扬, 刘继来.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3):269-278.
- [32] ALKIRE S. Dimens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J]. *World Development*, 2002, 30(2):181-205.
- [33] 田园, 蒋轩, 王铮.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成因的地理学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5(5):32-43.
- [34] 何仁伟, 李光勤, 刘邵权, 等.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11):69-85.
- [35] 方方, 何仁伟, 黎春. 我国扶贫管理的内涵、问题剖析与对策建议[J]. *农业经济*, 2019(9):72-74.
- [36] 杜国明, 黎春, 何仁伟. 中国精准扶贫的区域治理思想解析[J]. *资源科学*, 2020, 42(4):649-660.
- [37] GLEWWE P. Investig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welfare in Côte d'Ivoi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1, 35(2):307-337.
- [38] 罗庆, 樊新生, 高更和, 等. 秦巴山区贫困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6, 36(4):126-132.
- [39]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 72(1):116-134.
- [40]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基于格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及空间指向性的地理要素识别——以环渤海地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5, 34(6):1077-1087.
- [41] 黄木易, 方斌, 岳文泽, 等. 近 20a 来巢湖流域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J]. *地理研究*, 2019, 38(11):2790-2803.
- [42] 王正雄, 蒋勇军, 张远喆, 等. 基于 GIS 与地理探测器的岩溶槽谷石漠化空间分布及驱动因素分析[J]. *地理学报*, 2019, 74(5):1025-1039.

- 
- [43]胡振宇. 安徽区域中心城市与门户城市分工演进研究[D]. 安徽师范大学, 2007.
- [44]张金萍, 宋伟, 林丹, 等. 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致贫风险分析[J]. 地理科学, 2020, 40(4):608-616.
- [45]高军波, 喻超, 戈大专, 等. 不同地理环境下农户致贫机理的多尺度比较——以河南省为例[J]. 资源科学, 2019, 41(9):1690-1702.
- [46]潘竟虎, 冯娅娅. 中国农村深度贫困的空间扫描与贫困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J]. 地理学报, 2020, 75(4):769-788.